

東 北 文 學 史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东 北 文 学 史

· 东北文化丛书 ·

东北文学史

马清福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沈阳

辽新登字3号

东北文学史

Dongbei Wenxueshi

马清福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430,000 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18³/₄ 插页:6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责任编辑:杨爱群

责任校对:唐惠凡

封面设计:李勤学

ISBN 7-5313-0579-8/I·546

定价:14.00元

前言

说起东北，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些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民谣俚语。诸如“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一作“人参、貂皮、乌拉草”），“棒打獐子瓢舀鱼”等等。这些谣谚俗语固然说明了东北自然资源之丰富，但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某种蛮荒之感。殊不知，作为祖国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北，绝不是像某些人想象中那样的荒蛮之地，也绝不仅仅只是一块物质资源丰富的好地方；它与中华大地其他地方一样，是一块富于高度文明和精神财富的地域。

一 东北事实上存在着文学史

早在距今五六十万年以前，东北大地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创造着与北京猿人、蓝田猿人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旧石器文化，这已为辽宁本溪山城子后庙山、营口金牛山等多处文化遗址所证明。此后，在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发展的漫长历史中，东北人用他们聪明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诸如辽宁省喀左县的鸽子洞文化遗址、吉林省榆树县周家油坊文

1046

化遗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郊闫家港文化遗址、赤峰地区英金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遗址、昭乌达盟的富河文化遗址、黑龙江省密山县的新开流文化遗址，以及辽宁省沈阳市的新乐遗址，就是充分地有力的证明。这说明，东北大地与中原有着同样古老的文明，有着同样悠久的文明史。

东北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文明，可是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究其原因主要是治东北史的人不多。二十四史中的《辽史》、《金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东北史，《元史》也可以说是部分的东北史，但是上述史著只是记载了东北某一阶段的历史；加上由于当时治史条件的局限，片面性和不尽科学之处太多，远远不能反映东北历史发展的宏阔面貌。到了近现代，治东北史的人较前多了些，出现了东北史家金毓黻，当代则有吉林大学的张博泉教授，他们在治东北史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这在中国史学队伍中只是很少很少一部分；面对丰富的东北历史，其力量是很微弱的。至于对东北文化史、艺术史、文学史的研究，则人手更少，所作的工作就更不够了。新中国成立已经半个世纪了，可是至今尚未看到一部东北文化史、东北艺术史和东北文学史。著者祖籍东北，生于东北，长期以来有感于东北文学之无史，所以才以微薄的力量撰写了这部《东北文学史》（上古至鸦片战争），目的是让东北人民了解自己的祖先所留下的文学财富，同时也填补了东北文化史上的空白。

长期以来，一些人不知道东北古代有文学。前些年，有些人曾遗憾于东北风光的不被人知，并把原因归之于历史上没有诗人作家去描写。他们认为，东北的风光同样是无限美好的，诸如兴安雪海、草原轻骑、医间风光、天池空影、千山叠翠、长白瀑布等等，可以说是不亚于桂林的山水和黄山的云松，但由于没有人

传播(没有人描写),所以便无人知道了。其实,这种说法是很不确的。因为事实上,东北的风光并不是没有诗人作家去传播,东北人民的历史生活也并不是没有文人去反映;真正的原因乃是这些文人作家的描写,没有文学史把他们介绍给今天的读者而已。比如长白山、松花江、医巫闾山、大凌河,以及整个东北大地的山山水水,早就有诗人去描绘去赞颂了,他们留下的作品是不乏脍炙人口之作的。爱新觉罗·玄烨的《松花江放船歌》,东北大词人纳兰性德的《浣溪沙·小兀喇》,盛京诗人高塞的《登医巫闾山观音阁》,诗人姚元之的《大雾渡辽河》,清前期大散文家常安的《盛京人物颂》等诗文,无疑都是可以列入统一的中国文学之林的优秀作品。东北大地的风光,东北人民的历史生活,不仅东北籍的诗人作家有反映有描写,就是中原的一些名作家名诗人有的也曾作过反映描绘。例如,唐代的诗人王建、韩翃、沈佺期等,就都曾留下了歌咏辽东的诗篇;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就曾到过东北辽宁省的朝阳,并写下了诗篇《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至于流戍于东北的清代诗人吴兆骞、函可、方拱乾等,则把东北视为他们的第二故乡,都留下了歌颂这第二故乡的诗章。由此可知,东北的历史是不乏文人作家的,东北的风光和历史是早就有诗人作家描绘的。就是被称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瑰宝的小说《红楼梦》也是可以称之为东北文学的。这是因为,不仅这部著作前八十回的作家曹雪芹是东北籍,就是续写后四十回的作家高鹗也是东北人。综上所述可以说,东北事实上存在着丰富的文学史。拙著《东北文学史》只不过是对于事实上已经存在着的东北文学史的记录。

二 东北文学史的作家范围

“东北”的疆域位于中国的东北方。“东北”作为地域名称，最早见于《周礼·职方氏》，其所辖地理范围随着历史沿革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但其基本范围是变化不大的。《周礼·职方氏》记载说，“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说，“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山（今长白山），有肃慎氏之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知道，当时的“东北”实际指的就是以医巫闾山、辽河以及满族先世肃慎人生活的白山黑水一带为范围的广大松辽地区。

《书·禹贡》把中国大地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和雍等九州，一种说法认为“东北”属于当时的冀州（也有认为属于青州者）。《吕氏春秋·有始览》也把中国大地分为九州，所不同之处是有“幽州”无“梁州”，余皆相同，后来的大多典籍认为“东北”属于幽州。《史记·夏本纪》说舜“分青州为营州、辽西及辽东”，《通典·州郡典》说舜“分青州为营州，置牧，宜辽水之东是也”。据此，有人引申出一种说法认为：舜分冀州东北为幽州，即辽河以西之地；分青州东北为营州，即辽河以东之地；上古时的“东北”即指幽州、营州之地。

战国时期的燕国设巨鹿、广阴、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七郡。右北平位于今河北和辽宁两省交界地区，包括今天的承德地区；辽西郡包括今之锦州以西、山海关以东地区；辽东郡包括今之辽河东西两侧，以辽河以东为主。可见，战国时的“东北”相当于今之辽宁省和河北承德地区及其以北之广大区域。战国末期，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变化不大。

西汉时期，东北南部属幽州刺史管辖，先后设有右北平、辽

西、辽东、乐浪、玄菟诸郡。右北平相当于今之赤峰、凌源、承德一带，郡治在平刚（今凌源南）；辽西郡相当于今之敖汉、朝阳、锦州和秦皇岛一带，郡治在阳乐（今义县西）；辽东郡相当于今之彰武、铁岭、沈阳及其以南一带，郡治在襄平（今辽阳）；玄菟相当于今之辽宁清原和吉林通化以南一带，郡治在当时的高句丽城（今辽宁新宾西）；乐浪相当于今朝鲜之清川江以南、汉城以北地区，郡治在当时的朝鲜城（今平壤南）。可见，当时的东北应指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四郡之大部分及其以北地区。

东汉时期的东北，南部仍属幽州刺史部管辖，设有辽东、辽西、玄菟、乐浪四郡和辽东属国五个区域。辽东郡相当于今之黑山、辽阳、本溪一带，郡治在襄平（辽阳）；辽西郡包括了今之辽宁建昌、锦西和河北唐山以东一带，郡治在阳乐（今义县西）；玄菟相当于今之沈阳、铁岭、抚顺地区，郡治在高句丽城（辽宁新宾西）；乐浪仍位于今之朝鲜平壤地区。辽东属国位于锦州、盘山地区，最初是西部都尉管辖之地，汉安帝时改为属国都尉，所以史称辽东属国。汉末至三国，东北南部的割据势力是公孙氏，辽东太守公孙康，其所统辖的辽东、辽中、辽西、玄菟、乐浪，大体相当于汉之郡治地区。

西晋时期，晋武帝将东北南部分为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五郡，归属平州管辖，治所在襄平。大致范围仍是今日之东北和朝鲜。隋唐时期，虽然也在东北设有相当的郡州治所，但是已经出现了地方性的民族国家渤海国。宋以后至清，东北的民族女真、蒙古、满族（女真后裔为主体的民族共同体）先后成了中国封建王朝或地方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东北的疆域郡治在名称和范围上发生不少变化，但是大体上没有超出今之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河北省之热河地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之呼伦贝尔

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拙著《东北文学史》所写的范围，是一个地理上跨省、区和地域的概念，主要包括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三盟和河北省的承德地区。这三块地域不仅今天疆域相联，在历史上更是互相包容难以分清的。《东北文学史》就是以此来界定作家范围的。

从外延上说，东北文学史是由东北作家的创作构成的。《东北文学史》把东北文学史上的作家分为下列五类：

（一） 原籍东北、生活在东北、反映东北历史生活的作家，这是《东北文学史》着重介绍的内容。如明代的东北著名诗人贺钦，清代的东北诗人高塞等，就是这个范围里的重要代表。

（二） 原籍东北（或祖籍东北）但却长期在外地生活或为官的作家。对此，《东北文学史》重点介绍其成就较大者，如元代的耶律楚材等。这类作家中有些是自称东北人、时时不忘家乡者，例如经常自称“沈阳唐英”但却在江西为官的大作家唐俊公，《东北文学史》当然应该把他们列为重点介绍。至于那些长期居于外地而又成就不大的东北籍作家，拙著只是录而不述。

（三） 籍贯外域但却长期生活在东北的作家（包括在东北为官和长期流戍东北者），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反映了东北人民的历史生活、描绘了东北的大地山河，《东北文学史》同样将他们做为重点作家加以介绍。他们的作品往往既表现了对于第二故乡的热爱又反映了某种思乡的情绪，这正是他们作品的独特之处。

（四） 路经东北写下了反映东北生活的作品的文人作家（包括出使东北和来东北探亲等），《东北文学史》重点介绍其反映东北的作品，余则不述。例如唐太宗的《辽城望月》、唐诗人王建的《辽东行》，就属于这一类。

（五） 虽未到过东北但却写下了反映东北的作品者。对此，

《东北文学史》把它作为反映东北的文学予以介绍。

三 东北文学史的分期

和中国文学史一样,东北文学史也是可以相对地划分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但是这种划分只能按照东北文学发展历史的自然历程来进行,不可离开客观的实际去做主观的归并和挪移,因为那样做则违背文学历史的真实;东北文学史有着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相对的分期也不能雷同于普通的中国文学史。《东北文学史》根据东北文学发展的自然历程,把东北文学发展的历史划分为如下阶段:

- (一) 上古时代的东北文学;
- (二) 诸族互竞时代的东北文学;
- (三) 南北朝时代的东北文学;
- (四) 隋唐时代的东北及渤海文学;
- (五) 辽代契丹社会的东北文学;
- (六) 金元时代的东北文学;
- (七) 明代及后金社会的东北文学;
- (八) 清代的东北文学。

东北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东北文学史是多民族的文学史,是多民族的文学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东北的现实和民族社会所作的描绘,其所表现的是东北各族人民生活斗争史和东北各族人民的心理素质;若说有什么共同性的话,那就是由于民族间的文学交流所形成的民族文学融合的特色。由于民族社会历史进程的不尽一致,由于民族社会的发展有着事实上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别,民族文学融和过程中表现出某种趋同现象是必然的;这种趋同现象是民族文化跃进的表现,是民族文学发展进步

的标志,绝不是谁屈服于谁、谁吃掉谁的问题。趋同本身也是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色。例如,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至奴隶制时代的女真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的融合,以及融合中表现出来的吸收汉族文学遗产的倾向,就包含着某种趋同的因素,这无疑是一种文学的进步。东北文学由于东北地域自然状况和气候等条件的不同,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地域性特色,这是以地理、气候的影响为表征的艺术形态学的特点,是研究东北文学史所应该注意到的。东北文学发展的特殊性,形成东北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

奉现在专家和读者面前的这部《东北文学史》属于初创。由于直接可参考的史著和史料的缺乏,加之本人学术水平所限,拙著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或错误,恳望专家、学者和读者给予指点帮助。

马 清 福

1990 年于盛京陵西小舍

序

刘烈恒

摆在面前的东北文化丛书——《东北文学史》《东北艺术史》《东北俗文化史》《东北古文化》《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是试图从文化视角和层面系统地探讨研究东北社会历史的系列专著。这套丛书概述了从上古至近代东北文化的流变和发展，展示了东北古代社会文化的总体性概貌。它是对东北民族文化进行发掘整理的一次尝试，是地域性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收获。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东北这个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地域始终存有心理上的模糊和疑惑：东北有没有自己的历史，史自何时，源于何处；东北有没有自己的文化，其文化能否构成“史”的体系和形态。随着民族文化研究的深入和地域文化研究的拓展，诸如此类的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毫无疑问，人们期待着研究者的回答。

文化的研究离不开历史作依托，从社会文化的体系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的投影，而历史的变化又直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因此，文化现象不可避免地进入史学家的视野，并构成历

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的成果关系到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人们注意到，一个世纪以来，对于东北古史的研究，不少史学工作者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他们留下的诸多著述，尽管其各自观点不同，角度方法有异，史料丰简有别，但却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东北古史奠定了基础。作为区域史或地域史的研究，至少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不仅证明了东北同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而且发现了它与中原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还确认了它在我国历史中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这些历史成果当然也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依据和佐证。

东北是整个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今天已是一个没有人怀疑的问题了。但是，这一疆域是怎样形成的，其历史发展进程如何，有什么特点和规律等等，仍然是许多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面临的研究课题。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心血和智慧揭开了历史的迷雾。大量考古资料和有关文献记载表明，早在奴隶制之前的旧石器时代，在广阔的东北大地上，就遍布着古人类原始群体的足迹。当北京周口店的“中国猿人”在华北地区的山林和原野之中艰苦垦殖的时候，东北的“庙后山人”也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着前赴后继的开发劳动。其后的“金牛山人”和“鸽子洞人”则已经步入了早期智人阶段，他们不仅具有相当进化的体质，具有较高的物质资料生产能力，而且能够适应较为复杂的生活环境。特别是逐渐脱离了血族群婚乱居状态，进入了族外群婚阶段，跨向了氏族社会。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可以说，“庙后山人”、“金牛山人”、“鸽子洞人”等原始人群，同是中国古人类群体中的成员，他们与“中国猿人”有着血缘关系，其先人是“中国猿人”古人类母体

中的一部分。这些原始居民，在漫长的年代里从事着辛勤的劳动和创造，逐渐结成了分布广阔的不同语族部落集团。这些属于华夏族先世、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先世、涉貊语族先世、肃慎语族先世等等的氏族部落，占据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大地域，彼此间开始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这些经济和文化形态中有着与中原经济、文化不可分割的印记。这说明，东北地区的原始居民所创造的经济、文化及其与中原的联系，既为开发东北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也为东北疆域的形成、发展和扩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当人类开始活动和生活的时候，文化的创造也同时开始了。大量的考古发现告诉人们，东北古人类的文化与中原古文化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共性，这些共性充分表明我国旧石器文化在地理上的广泛联系性，表明了东北与华北两地文化的内在渊源关系。只要稍稍注意一下东北的出土文物和文化遗址，就不难发现其与黄河下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密切联系。属于中原仰韶文化构成因素的彩陶，在东北有多处出土，从红山、小珠山、小河沿到北部遍布着文化遗址，其质地、器形、图案、风格与仰韶彩陶极为相似，明显见出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属于龙山文化体系的蛋壳黑陶，在东北的旅大地区、郭家村等地都有发现，它们的特性与山东龙山文化极为一致。特别是在石器制造上，压制石器在辽、吉、黑三省西部和内蒙东部分布十分广泛，而压制石器最早则起源于黄河流域，东北地区的普遍存在正是中国内地文化向东北传播并不断给东北文化以影响的佐证。事实上，考古发现的类似情况还远不止这些。另外，从东北文化遗址的分布和走向情形，还可以看出，构成中原与东北联系的孔道主要是辽东半岛和辽西走廊，这是由于它

们地处与中原接触的先端，在接受中原文化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因而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较早较快，水平也较高。东北与中原就是在这种联系中互相濡染、互相促进、互相融合，创造并形成了中国史前期文化的同一性。它一点不仅证明了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东北与中原就构成了不可分割的同一体，而且为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东北地区逐渐纳入中原中央政权的统辖范围，奠定了深厚的物质文化基础和悠久的历史基础。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东北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并且逐步发展为对中原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东北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由原始氏族向奴隶制和封建制转变的过程中，夫余、高句丽、慕容鲜卑、粟末靺鞨、契丹、女真、满族等都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种政权的建立无一不受到中原封建制的影响。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抛弃了本族的旧制，直接因袭了中原的魏、晋封建制，其封建制的建立基本上是中原旧制的继承和延续。高句丽的封建化虽然还保有本族的某些特点，但同样是吸取中原封建制的政治、经济精神完成其社会变革的。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基本上是模仿唐制的封建政权。其他民族的封建化的变革也大抵经历了相同或相似的道路。这样，才得以保持了它们与中原政权对峙或统治全国的地位。由此，进一步促进了东北与中原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和传播，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彼此间共性的扩大与增强。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古史在其发展中还具有独自的个性，这对于研究其在中国历史总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探究其文化发展的特征，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意义。辽、宋以前，作为中原统治民族的主要是汉族，而东北的民族政权则臣属于中原王朝。从辽、宋开始，东北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过去是以汉族为

主统治中原的历史一变而为少数民族为主统治中原的历史，过去的纳贡者成了受贡者，辽、金取得了正统地位。这种变化，对取得统治地位的民族和其他民族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中原的汉人开始向东北迁徙，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也向东北大量传播，政治、经济的统治中心也随之北移。南北民族的大对流，不仅改变了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而且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融合。东北历史的这一特点使它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居于特殊地位。同时说明，深入系统地研究东北历史和东北文化更具有极为重要的特殊意义。

我们借助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的成果，粗略地描述了东北古史发展的脉络与轨迹及其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证明了东北的土地始终是中国历史疆域的一部分，东北的各族始终是中华民族共处一室的兄弟成员，东北的经济文化始终接受着内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与哺育。这固然是有意义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组织编写东北文化丛书的最初构想正是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启发下孕育出来的。史学家呕心沥血的研究和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的发掘，证明了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东北不仅有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完整系统的历史，而且有丰富斑斓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虽然与朝代更迭不是机械对应地同步发展，而且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但作为社会的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文化亦有其特定的形态和体系，而且与政治、经济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正是在这个基点上，我们大胆地下了决心——从不同侧面编写东北文化发展的历史，以填补目前在这方面研究上的空缺，从而与史学家的研究互为补充，互相映衬，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东北历史和文化的建设与积累工作。

这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工程。应该说，当确定这套丛书的选题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底数还不是很明确的，对构建这项工程的价值是否能取得客观的认同尚存有茫然感。但是我们坚定不移地确信，东北这块黑土地既然有悠久的历史，同样也有深厚的文化土层，关键在于如何去开拓发掘。近年来兴起的“文化热”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是，文化研究将有助于更科学地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历史。英国著名学者泰勒提出：“文化或文明，从广义民族学的意义上说，是一个整体，包括人类社会中获得一切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的能力和习惯。”列宁则更明确指出：“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列宁全集》第19卷，第504页）而且文化往往先于政权而生成，人类一出现，文化也便随之产生了，因此它具有普遍性的特点。要廓清这千丝万缕的“联系”，单纯地从某一点或某一方面，比如从社会的、心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等方面去解释，虽然也能获得某些合理的认识，但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必须把各种局部方面的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进行文化的整合，从整体化和系统化的角度加以观照和研究。人们知道，历史的研究通常注意的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带有共性的东西，进而把它概括为历史规律。而文化则是每个社会、每个民族所特有的东西。它是社会区别的标志。通过文化研究去观察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区别，要比从种族、血缘、地域、政治以及肤色或其他生理方面去区别，会获得更深刻更科学的认识，因而也更有意义。

各个民族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也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着各个民族。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它伴随着